

儿童文学需要重新面对现实主义

——记“曹文轩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

本报记者 王杨

9月11日,由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共同主办的“曹文轩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孙柱、作家曹文轩、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学谦、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明舟,以及部分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等从对苦难的悲悯书写、对人性真善美的展现以及打好精神底色的价值担当等多个方面,研讨了曹文轩儿童文学创作中最为突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并由此探讨了当代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

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呼唤现实主义作品。谈到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李敬泽认为,曹文轩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在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曹文轩的儿童文学作品在描写现实的困顿、忧伤、疼痛时,也在一直展示着其中的亮光。孩子从中不仅认识了生活和社会,同时也获得了创造生活的勇气。这样的创作值得深入探讨并总结经验,从而推动儿童文学创作不断由“高原”迈向“高峰”。

为什么需要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精神曾经在文学史上独领风骚,而一段时间以来,随着虚构、想象、幻想等不断被提及,现实主义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针对这种现象,曹文轩提出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现实主义?

曹文轩说,前些年,自己说得最多的也是虚构、想象、幻想这些词。这没有错。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缺乏想象力,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多年以后,他发现了问题的另一面——当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虚构”“想象”之上时,我们的目光渐渐从历史、从现实之上挪移开了,殊不知被忽视、被漠视的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性写作资源。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是任何虚构、想象都无法相比的;它们的神奇、出人意料以及其背后复杂而丰富的含义,是远远超出“虚构”“想象”所能给予的。

曹文轩认为,由于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淡忘,我们不仅对“现成的”、“绝妙的”故事视而不见,而且还逐渐忘却了“功夫”二字,忘记了对“功夫”的操守。现实主义是讲功夫的;观察天下万物,破其机密的功夫。就像绘画强调从完全逼真的素描开始一样,现实主义作家也需要苦练基本功——真切感受存在的基本功,因为有价值的文学艺术创意都是建立在功夫上的。由此曹文轩提出,中国的儿童文学是不是需要重新面对“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仅可以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经历,更主要的是能引发读者思考。金波认为,思考是读小说的延续,是超越小说的再创造。能引发思考,正是现实主义的力量。儿童文学有教育、认识、娱乐等多种功能,但这些功能的取得,离不开读者学会思考。读者要关注原生态的现实,还要感受艺术创造中的现实,从而思考并回答所面对的人生与世界。在《活力和思力并重的儿童文学精神》一文中,金波曾谈到:“无论你用哪一种体裁、哪一种技巧写作,心目中永远有一个现实

生活,这就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实践有根的写作。”他说。作为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家,要把当代儿童的成长和表现,植根于当代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结合历史的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创作有中国味道、中国气派的儿童文学。

2017年出版的少儿新书共有22000多种,比2016年少了近2000种,从数据上看,少儿出版依靠品种数量规模扩张的野蛮生长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少儿出版从高速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而少儿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柱就是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李学谦对少儿出版的繁荣局面表示出一些隐忧,主要是目前儿童文学原创图书出版中同质化、跟风出版、重复出版的东西不少,另外很多内容惊悚、搞笑的原创图书在孩子的阅读中还占相当大的比重。他认为,娱乐当然是可以的,但改革开放40年来,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中国孩子的故事可以讲。比如表现农村留守儿童、网瘾少年等特殊儿童群体的现实题材作品,在现有的文学作品中还比较少。对此,他认为应该重点加强现实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作,为了少儿出版的高质量发展,为了儿童文学的持续繁荣,需要在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应有更多的精品力作出现。

对现实苦难的悲悯之情

谈到现实主义创作,如何在儿童文学作品中表现或揭示生活的艰辛乃至苦难这一话题,一直被广泛讨论。李东华用“清醒的现实主义”来描述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清醒”是说曹文轩从来不回避童年生活中的苦难因素,从来不害怕把孩子们放置到真实的客观现实中检视他们的成长,在这一点上,他是开放的、客观的,甚至是冷峻的。他笔下的孩子不会生活在与家庭、社会相隔绝的虚构的桃花源之中,而都是扎根于中国的土壤,生活在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中。从《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青铜葵花》到“丁丁当当”系列,曹文轩作品所容纳的社会内容和时代内容越来越广阔,这也证明,儿童文学有能力去处理更为厚重的时代和人生内容。李东华说,从另一个角度看,曹文轩的“清醒”更在于他在冷静客观地呈现现实的时候并没有陷入欲望化和娱乐化写作的陷阱。在他心目中,文学不是带着读者在现实的阴影中陷落,而是以其光芒照亮人性的幽暗地带。曹文轩在书写中不断捡拾着平凡人性中细小的善与美,将其汇聚成河,成为抵抗苦难和丑恶的有力武器,由此构成其作品充满悲悯情怀的“纯美”叙事。

曹文轩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能够让人们安静下来的文学,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都应该有悲悯情怀做底子”。张明舟认为,曹文轩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历经艰辛苦难,但作家饱含悲悯情怀,没有让主人公怨天尤人或记住仇恨,而仍然满怀希望,执著向前,传达出人类共通的朴素情感和高贵追求。他被国际认可,是对他的全部作品文学艺术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他以儿童视角,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和悲悯情怀的认可。

徐则臣谈到,在曹文轩笔下,苦难与正当的道义感紧密联系,这既源于曹文轩对苦难之于人性的拣选和培植有切身的体认,也基于他对人性的基本理解。曹文轩笔下的主人公,比如

丁丁当当、桑桑和秃鹤《草房子》,细米《细米》,青铜和葵花《青铜葵花》,明子《山羊不吃天堂草》,林冰《红瓦》等都经过苦难的锤炼,苦难是人物形象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悲悯也是人性中重要的基本美德,因此,曹文轩才会将其作为儿童文学理念的重中之重加以强调。徐则臣认为,曹文轩作为作家的悲悯,在于他坚持庄子意义上的齐物论,众生平等。所有人物相处,最终都能和谐;即便劫波历尽,生命和生活依然有希望在前方导引。

展现人性真善美

与会者认为,曹文轩作品对于少年儿童的意义,就是让他们心中播下真善美的种子。他的《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青铜葵花》《细米》以及“丁丁当当”系列等,在描绘现实苦难的同时,注重对主人公心灵历程的展现和对真善美的坚持,歌颂了人性的可贵与美好,让孩子们在看到苦难的同时,也获得走出苦难面对未来的勇气,这体现了作家的价值担当和美学贡献。

在《丁丁当当》系列中,油麻地的丁旺夫妇连续生了两个痴呆男孩——丁丁当当。家庭的沮丧、外人的议论,使原本应该平静的生活一片狼藉。丁旺夫妇不堪重负先后离世,坚强的奶奶独自承担了抚养两个傻孙子的义务。终于,当当走失了,奶奶、丁丁急切地要寻找到当当……孟繁华认为,《丁丁当当》讲述了一个流浪和相互寻找的故事。在流浪和相互寻找的过程中,丁丁当当与不同人物交往,作家同时也写出和批判了社会上不义的人和事。但这些人物或情节不是小说的主体,作家意在表达的还是人性的善与爱,小说底色恰如鱼鹰爷爷摇荡的那只渔船,青山绿水间洒满了人性的光焰。以残疾儿童作为故事主要讲述对象,表达了曹文轩对弱势儿童群体的关注,愿意以自己的创作唤起社会的同情和关注,并对他们施以切实的援助。

真善美是文艺永恒的主题,但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其背后蕴含着复杂深刻的历史与美学问题。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对真善美的认识和理解并不相同。李云雷认为,曹文轩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回答了如何表现和定义我们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真善美这一重要问题。在他的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真”、“善”、“美”并不是抽象的词汇,而是深深扎根在现实生活的逻辑之中,是通过小说主人公在人生处境中的艰难选择自然而然体现出来的。作者在作品中展示了“真”克服“假”,“善”克服“恶”,“美”克服“丑”的过程。只有在这一过程中,读者才能认识到假恶丑无所不在,也才能认识到真善美的珍贵与来之不易;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读者才能克服心中的人性之恶,扎下真善美的种子,对人生与人类的未来抱有希望。李云雷说,曹文轩在小说中对苦难与美德的探索与坚持,对故事中小主人公心灵历程的描绘,重新定义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与美,也在重新塑造着人们的心灵坐标,这是他的价值担当,也是他的美学贡献。

谈到“丁丁当当”系列作品的审美价值,刘颋认为,在世俗

意义上,丁丁当当是低能儿,只有自己单纯的对世界的认知和对社会的理解;但在审美表达的意义上,两个孩子恰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世俗中高智的低和小。围绕《丁丁当当》的现实性叙事,有效屏蔽了世俗社会的功利和丑陋,只留下生命中的善良、美好和单纯。《丁丁当当》系列本身就是对今天这个功利和算计的时代的无声批判。

打好精神底色的价值担当

作为一名具有浓厚使命感的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曾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儿童文学要担负起重新塑造民族性格的责任。进入21世纪,他又提出“儿童文学要给儿童打精神底子”,也就是说,要向孩子们传递关于美、关于爱的认知,传递关于勇气、道义、坚韧的力量。

汤锐认为,曹文轩小说所描绘和刻画的往往是他审美理想中少年人生存和成长的状态,这构成了他小说特有的诗性。这种诗性对于正在成长中的少年儿童具有“打精神底子”的意义。首先是坚韧、积极向上的个性和人生态度,譬如《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细米》《青铜葵花》等小说中的主人公,那些物质生活贫穷但却有一副傲骨的乡村少年,坚韧、执拗,面对苦难和逆境,积极向上永不服输。第二是善良的情感和道义的力量,亲人之间、伙伴之间、陌生人之间,无处不在。《草房子》《青铜葵花》《丁丁当当》系列等作品散发出的富于感染力的诗性,传递出作者本人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人间固然有苦涩与沧桑,但人间也有道义和大爱。这些对每个时代的少年儿童读者都是积极向上的,是促进他们健康成长的。第三是审美的启蒙。曹文轩笔下,无论是江南水乡之自然美,少男少女成长中的个性美,还是文学语言表达的优美典雅,都践行着他所说的“为儿童打下一个具有审美根基的精神底子”的理想。

关于审美的启蒙,贺俊认为,曹文轩有自己明确的审美理想,无论社会时尚如何变化,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审美理想,追求“优美”的美学风格,甚至达到“唯美”的地步,这需要勇气,也体现出曹文轩在美学上的自信。同时,曹文轩的“唯美”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而是把重心放在挖掘优美的精神内涵上,是一种具有思想深度的唯美写作。强调儿童文学的思想深度,似乎是走一条逆行线,但曹文轩却成功了,关键原因是对他儿童文学的本质有更透彻的理解。他知道如何沟通儿童思维与成人思维之间的沟壑,曲径通幽。他的作品耐人琢磨,可以久品,有一种绵长的艺术感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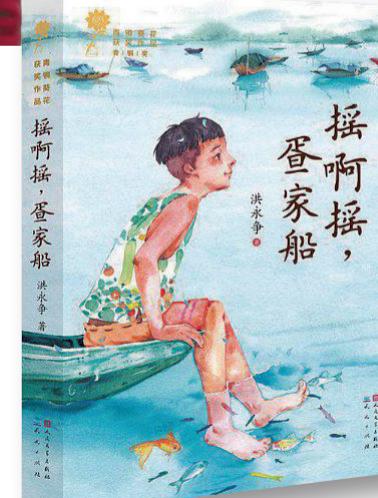
张之路谈到,生活本就充满了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无论文学作品是想象还是写实,都要阐述一个道理:人的一生要活得有意义,要活得像一个人,要有尊严,同时还要给别人尊严。孩子们的生活状态虽然因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但是儿童文学创作仍然有许多不变的因素,诸如是非善恶的判断,对正直、诚实、勇敢等优秀品质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能够让孩子感动,更为重要的是,能够让孩子热爱这个世界。

“我想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

□洪永争 王杨

看一看,结果发现,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与成人文学有一样的内涵:悲悯、善良、正直……于是,我彻底改变了对儿童文学的看法,我觉得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一样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作家的所思所想,传达人类普遍的情感价值,让人感动,让人深思。从那时起,我比以前更加关注儿童文学了。

在我看来,创作成人文学和创作儿童文学没有太大的区别。无论是成人的还是儿童的,属于文学核心性的东西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种文学类别没有高下之分,只有作品的好坏之别,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相反,由于我能熟练把握



成人文学题材,写起儿童小说反倒觉得更加得心应手。所以我在写儿童小说的时候几乎没有遇到困难。从具体创作来看,成人文学和儿童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区别的。儿童文学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儿童,因此,以儿童为本位这个中心是不能动摇的。离开了这个中心,哪怕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儿童,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小说。

让我对儿童文学感兴趣的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原因,我每天都与学生打交道,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加上我十分喜欢孩子的世界,如果能够把儿童小说写好,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那该是一件多有趣的事啊!

从那时起,我便开始留意儿童文学的创作,灵感来

时偶尔写写,那段时间大约创作了四五篇儿童短篇小说。直到我确定要写疍家渔民这一题材时,我才开始广泛创作儿童文学。

记 者:您近期的两部长篇小说《浮家》《摇啊摇,疍家船》都是写广东疍家人独具地方特色的水上生活。为什么对疍家人这种极富地域特色的生活情有独钟,将其作为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

洪永争:一直以来,我都想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经常把目光投向我的家乡。流经我家乡广东阳江双捷镇的漠阳江上,有一座雄伟的拦河坝,这是一项引水工程,也可调度河上船只的运行。我家乡是改革开放前阳春县至阳江县水路交通的重要码头,水上交通十分便利,聚集了无数的疍家人。我从小对他们的水上生产和生活十分感兴趣,至今印象深刻。

由于时代发展,以前漠阳江上帆影绰绰,机声隆隆,歌声悠悠,炊烟袅袅,可如今的漠阳江重归于平静,往日的水上繁华不再,让人感慨万千。大约十多年前,我有感于时代的发展和传统疍家渔民亲情、环境和风俗的变化,想以文字记录这一段逝去的民族风俗画卷,让现在的、尤其是孩子们了解并喜欢南国风情。几经构思才发现,将这样一种题材写成儿童小说似乎更有意义、更有张力。于是我开始着手写《摇啊摇,疍家船》这部长篇小说。为了写好这部小说,我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多次到江边、海边采访渔民,深入了解疍家渔民的生活,力求每一个细节都具有真实的力量。

至于我为什么要写《浮家》,主要是因为我在采访疍家人群体时,发现了他们面对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可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窄小了,他们面临着水岸两难的抉择。条件好的,当然希望离开水面,上岸居住,从此结束风雨飘摇的历史;家境贫困的,只好望“陆”兴叹,继续在水上风雨飘摇。有感于此,我开始写《浮家》,写他们在走向现代文明中的阵痛和挣扎,但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儿童的视角去完成的。我希望在历史厚重感和阅读轻盈感中找到一条通道。

我之所以热衷于疍家人这样一个题材,是因为这一题材至今鲜有作家涉猎,而这一题材既是我故乡的风物,又是我童年抹不去的记忆,我觉得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一题材写深写透。今后,我还会继续致力于对疍家人的书写,打造属于自己的文学高地,建设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

记 者:在前不久召开的关于您作品的研讨

会上,也主要研讨了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您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

洪永争:文学研讨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剜烂苹果”,帮助作家进一步提升。

而从研讨会上专家们的发言可以看出,他们的发言无论是赞美的,还是批评的,都是非常诚恳、严谨的,学术性非常浓厚。一个作家当然喜欢听赞美的话,但我最看重的是批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也没有一篇作品是没有缺点的,在作家的眼里,他最好的作品永远是下一部。正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算批评的意见和作家的看法相左,我认为也是好的,它起码可以对一个作家有开阔视野和警醒、鞭策的作用。

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是研讨的一个延伸意义。不少专家指出了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一把双刃剑,弄不好,会让自己的创作落入地方风俗介绍的表现俗套,要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个“文学地理”,更要超越它,只有这样,作品才会打动人。他们认为,《摇啊摇,疍家船》无疑超越了这一点。

记 者:在作品中,您似乎并不回避展示出生活的艰难,您认为让孩子在文学作品中看到生活中的无奈和艰难,对于他们的成长会有什么样的作用?这种对于苦难的描述应该把握怎样的度?

洪永争:我总觉得文学作品,应该反映生活原来的样子,而不是回避,当然,对于儿童文学作品来说,反映这些东西要把握好一个度。

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生活也不可能永远都甜蜜,它也有苦涩、有苦难、甚至有阴暗的一面,儿童文学作品涉及这些内容,当然要审慎。但不管如何表达,我觉得作家展示给儿童读者的,其实这很简单,我是那种公私分明的人。上班时间,我就做自己的事情,只有回到家里之后,我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说,我的工作和我的业余创作毫无冲突,我创作的时间比较少,就是每天早上6点开始写,写到7点15分就去上班,每天如此。当然,有时候节假日也会写一点。我创作的两三百万字全是由这样积累下来的。

我觉得作家描述苦难,当他的读者是一群活蹦乱跳的儿童时,他应该是“述苦”,而不是“诉苦”。“述苦”是根据主题的需要,有选择地讲述苦难,让苦难为主题服务。“诉苦”则不同,它是漫无目的地向人倒苦水,而这样的苦水是完全没有选择的,甚至对儿童有害的。所以作家在描述苦难的时候,切忌用“诉苦”的方式,让小读者“知苦难”,而不陷“苦难”,继而超越“苦难”,成为净化灵魂的“纯净水”。

记 者:您认为儿童文学创作中最重要和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洪永争:我觉得儿童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营造一种适合小说文本的语言氛围。这种语言氛围关系到叙述者的视角,关系到小说情节发展,关系到小说品位。因此,作家在确定要写的时候,如何找到一种有别于作家以往的,有别于前人的,而又适合这个小说的语言氛围,我认为这是儿童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点,如果解决了这一点,小说就成功了一半。博尔赫斯和卡尔维诺的小说,每一篇都有独特的语言氛围,不重复自己,不重复前人。一个小说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是伟大的。

一个作家创作儿童文学最有难度的部分,就是如何突破自己,不重复自己。这是非常难得的。当一个作家处于写作的成熟状态时,自然而然地,他会沿用自己以往的写作经验。这是一种惯性。但当这种惯性出现得越来越频繁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他一定在不断地重复自己。这个时候,如何突破自己,如何让作品永葆新鲜,就成为作家亟待解决的难题。虽然我本人才华有限,但我会警醒自己,争取超越自我。

记 者:教师这一职业特点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您怎样平衡教学和创作的时间?学生们阅读您的作品吗,他们怎么评价?

洪永争:一般来说,职业对作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我本人来说,教师这一职业给了我创作的业余时间。如果我从事其他职业,不一定有比较充裕的创作时间。说到如何平衡教学和创作时间,其实这很简单,我是那种公私分明的人。上班时间,我就做自己的事情,只有回到家里之后,我才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可以说,我的工作和我的业余创作毫无冲突,我创作的时间比较少,就是每天早上6点开始写,写到7点15分就去上班,每天如此。当然,有时候节假日也会写一点。我创作的两三百万字全是由这样积累下来的。

为了激励我的学生,我经常会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他们剖析如何选材、写作,他们很喜欢听,爱屋及乌,自然也喜欢我的作品。有不少学生看了我的作品后,甚至还写了读后感,让我看了心里暖暖的。我也会问那些看了我作品的学生,他们除了说喜欢外,还说很感动,催促我继续写续集。能够得到他们的喜欢,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